思霞学艺

吴霜

思霞是个十三岁的小女孩，一年多前我见她的时候，她也就比桌子高不多少，一把有些发黄的头发，眉毛长得有点儿乱，眼睛很有神，大人说话的时候她警觉聪敏地听。思霞的妈妈王铮三十多岁，带着思霞从天津来到北京，辗转通过朋友找到了我，道明了她的想法：想让孩子跟我学唱评剧新派唱段。

大家都知道，我并不是专业的评剧演员，我是一个洋腔洋调的美声歌唱家，而且还是花里胡哨的花腔歌唱家。我能教一个小孩子唱评剧吗？

当然能啊，因为我妈妈是新凤霞啊。新凤霞的女儿自幼听的绝对不是西洋音乐，而是中国戏曲。最早的记忆是三岁时的印象，妈妈带着我去看她的演出，在剧场里，在排练厅，在她教学生的课堂上。还有我那个热爱戏曲的爸爸，他会带着我去看其他各类的戏曲艺术，京剧、曲艺、越剧、花鼓戏、川剧，甚至我几乎一句都听不懂的广东粤剧。想来当初父母是要我长大后成为一个戏曲演员，像妈妈那样。不过事实是，长大后的我受我的刘叔、作曲家吴祖强一家的影响而改变了初衷，去学了歌唱艺术，进歌舞团，入中央音乐学院，赴美国名校留学深造十多年。再回来时俨然是一个身穿曳地纱裙在钢琴边歌唱的“洋人儿”了。但是，我会把幼年时爸爸妈妈灌输给我的中国戏曲文化艺术扔掉吗？

听说过一句话吗？幼年的教养冠终身。深入每一个细胞的那些旋律和节奏，那些细腻的兜转，早已是我不用想起不必回忆就存在于身体里脑海里的一部分了。

思霞来的时候并不叫思霞，她的名字是思彤。说实在的，这是个好听有灵性的名字。但是改掉一个字自有用意。她学的是新派，“霞”字取义新凤霞派，顾名思义一目了然。一颗泥土中刚出土不久的青青种子，配以养分充足的光和水，这颗种子会长得顺利长得茁壮。

爽心园

当初的思彤，来的时候就已经能唱许多新派唱段了，她会唱《刘巧儿》《花为媒》《乾坤带》中的唱段，一个十岁刚过的孩子，这该是一个怎样的家庭给予的影响呢？其实和许多戏迷一样，她有一个极普通的家庭，思彤的姥姥是个评剧新派迷，在姥姥身边长大的小女孩听的都是新派唱段，会唱就是自然的了。只是到我身边的时候，孩子唱起来虽然用心，可味道不够，更谈不上婉转，一听而知是旁听侧学，捕风捉影居多。但是女孩的小声音很是干净，音准节奏不错，最可取的是胆子大、不怵头，将来若要走向专业，这才是最重要的条件。

学艺的圈子里讲究的是师资关系，如果孩子已经是某一位演员的学生，其他的老师是不能再插手的，那样是不道德的。即便明知学生戏路出了问题也不好过问。而思彤是业余学习，教过她的老师并非专业演员。她来找我，我便心安理得收下为徒，要教会她一口最具味道的新派。而教一个声带还未长熟的幼童，我的方法就是要打破戏曲教育的古老但并不科学的旧传统。

当我把想法告诉思彤妈妈王铮的时候，她朴实诚恳的态度给了我信心：吴老师，全都听您的，交给您了！首先为她改了名字，思彤改名思霞。然后开始了耐心而严格的歌唱过程：识谱。唱戏的大多不识谱，两百年前就如此，思霞也不会，到我这里必须要改变！于是我在前半节课上先教她识谱，练声。我让她在我的钢琴音阶的引导下发声，且只是小声唱，注重音准节奏、口型、气息和发声位置，一点点增加音高和音长，这和传统戏曲课堂上的“喊嗓”完全不同。在我，把西洋发声的科学方法引进到评剧课堂上，是事半功倍的高效率。唱段落的时候细腻度是重点，微小的变化、细致的转呈往往花费很长的课时，因为十五岁以前的歌唱学生是不能大力用声带的，他们的声带还在成长当中，用多了，拔苗助长，声带会崩溃。为什么那样多的戏曲童生在身体长成、年富力强时嗓子会“倒仓”坏掉，即是如此。

小思霞跟我学唱将近两年，身高长了，新派味道猛增，音质逐渐显出纯净清亮。我还为她在天津请了京剧院的一位专攻刀马旦的老师带她演练身段。今年三月，思霞参加了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评剧附中班考试，成功被录取。拿到录取通知后，我又带着她母女二人跑了好几趟北京教委，为孩子所需的天津本地的通过手续奔走。心里感叹着如今孩子学习艺术专业的艰辛，觉得小孩子艺考怎么犹如成人考研一般复杂？

思霞学艺刚刚开始，新派艺术之路正在她眼前展开。

有口难言

(台湾)桂文亚

午后二时，垃圾车准时唱着《少女的祈祷》缓缓开进巷口，我快步手提两大袋垃圾放在门口尤加利树下，进屋内又左右手各托两盆厨余飞速而出，生怕错过关键时刻。

向各位报告！扔垃圾对我来说，乃每日重点功课。尤其夏天一到，热气蒸腾，残余的羹汤果皮，如果不及时处理，发酵后令人晕眩的酸腐异味，即使再高妙的文字，也难以形容。

朝垃圾车驾驶先生招招手，他微笑缓缓停下车来，像往常一样友善地对我点点头。原本一直站在车厢上应接垃圾袋的年轻人没有来，出现了一张陌生黑脸，对我稳健的龟速皱起眉头。

两袋垃圾塞得满满的，一次只能往上抬一袋。好大的一对铜铃眼喔，不耐烦地瞪着我，圆盘脸黑乎乎的，脑袋大大的，完全是《三国演义》里张飞的造型。

我赶紧陪笑：“抱歉，太重了，还有一袋！”说完话，忙不迭又弯腰去捧起靠着树干的第二袋垃圾。“张飞”露出两排嚼槟榔后染了色似的牙齿，冲我“啧啧”两声。这下，我有点儿急了，赶紧喊道：“等一下！等一下！”

一手各捧一盆厨余，哗哗两声，糟糕！情急之下，肉倒进厨余桶，果菜皮倒进养猪桶！“张飞”十分火大，我赶紧陪笑：“失礼！失礼！”他皱紧双眉瞪着我。

从此我每日战战兢兢地倒垃圾，生恐引燃冲天炮。

真是的，火气干啥这么大？他的前任，一个小伙子，总是面带微笑，耐心地等着巷子里反应迟钝的老人家，当他们慢吞吞地举起垃圾袋，无论驾驶先生还是应接垃圾的小青年，丝毫不显急促，“慢慢来，小心啊！”

一天，“错”不单行！当我看见“张飞”先生横眉竖目满脸不耐烦，急中出错，又把肉骨头倒进了果菜厨余桶！只得赶紧鞠躬又敬礼，歉意连声。

自从出现“张爷”以来，只要垃圾车停靠家门口，那张不愉快的黑脸，总让我心中一沉，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

终于，挡不住心中积累的不快，趁着隔壁几户邻居忙着倒垃圾，我忍不住向驾驶先生告状了：“您这位新来的同事挺凶！一点儿耐心都没有，垃圾袋很重，我往上举很吃力，每次只要动作慢一点儿，他就吹胡子瞪眼，甚至哇哇乱叫！请您转告他不要用这种粗鲁态度好吗？”

一向和蔼可亲的驾驶先生叹了口气：“对不起！请多多包涵，我们这位同事耳朵有病，听不见啦！因为有些住户垃圾也不分类，什么东西都乱扔上车，他因为话说不清楚，一急，脸色不好，脾气也上来了……”

啊！原来是一位自力更生的听障者，难怪从不说话，只能横眉竖目，发泄内心的无奈和郁闷。

霎时之间，曾经有过的不满烟消云散……

艺术的眼睛

曹阳

有机会集中读了曹小航的部分诗歌，心头涌动一阵惊喜。上海检察系统有一位女作家曹小航早已不是新闻，我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陆续读到过她写的纪实文学作品、小说、通讯特写等，如《一个女检察官的手记》《检察官之死》等，都是写检察官生活，立意清新，文笔生动，视角独特。她当过记者、编辑，又是作家、诗人和检察官，可以说，她的诗歌创作和她的小说、纪实文学写作相比是别样的精彩。

小航具有诗人难得的一双艺术的眼睛。她灵敏地发现生活中的诗意题材，从执法到山水，从放生池到古巷，从奶奶的乡村到敖包，从山居到夹竹桃，从画室里的插花到成吉思汗陵墓，从寻访旧居到今时梅雨，从各时节好雨到冬眠，从插在花瓶里的芦花到南京公祭，从寒冰到樱花……仿佛世间万物她都能信手拈来化成诗的语言，举重若轻，推出颇具磁性的诗篇，令人激赏！

诗的语言是文学语言中最有美学价值的语言。小航具有创作语言的天赋，她的诗歌语言灵动、形象、优美，富有张力以至穿透力，很能吸引读者，引发读者共鸣。无论是一把尺、一把剑、一朵荷、海水、古刹、砖瓦、砚台、佛塔、乡村、大厦、白桦、乌鸦、风力发电杆、蒙古包、炊烟……都是作者随手巧妙设计优美诗句的零件以至芯片。随意读她的一首短诗《画室里的插花》：“一把剪刀/至尊红颜/薄命在绿叶白瓶//纠结春天/了却尘缘/似真似假/化成一幅出水芙蓉/在墙壁上静坐//寂灭的美/在留青的人生艳遇/不过挥手再见/就这么绽放//血色芳华/一日胜却一季花开/不负回眸一笑/倾心描摹。”类似实例比比皆是，尽显诗的语言之美。

八方书谭

小航更有构筑诗歌意境的生花妙笔。她匠心独运，笔下的意境，常常出人意料地具有大气象。例如《中国古巷》，没有怀旧的低吟，没有失意的浅唱，诗人又出人意料地放歌：“水墨里/眼光向虚空一掷/夜的阴影嵌进浮雕//半堵城墙/画个门框/给历史留一条退路……”激起读者无限的联想！她在《蒙古之远》祭成吉思汗墓时，构筑的意境当然更是大气象了，真所谓“思接千载，神驰万里”，具有不凡的震撼力。这样的大气象，在许多男性诗人中也不多，在女诗人中更是少见。这一点恐怕不能归功于诗人的艺术天赋了，而应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她的心志追求中去找到根源。她坦陈自己是“秉承‘文学给我情怀，法律给我胸怀’的理念”从事庄严的检察官职业和文学创作，并不断奋力前行。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小航诗作的成功之路。

(本文为诗集《一米之外》序 文汇出版社)

东望洋山的眺望

(香港)黄芷渊

忘了是第几次来澳门了。这里犹如香港的后花园，和我们有着一种特殊的关联。上次离澳时已经入夜，一个不经意的回头，我看到东望洋山上闪烁的灯塔，它仿佛在向我挥手道别，呼唤着我下次再来。迎着它的召唤，这次我要上山。到灯塔去。

东望洋山是澳门半岛最高的山岭，过去是澳门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地点。远远地，车就要停下来。沿着斜坡往山上走，人烟越来越稀少。

转弯处有一个保安亭，值班的老伯戴着老花眼镜在看报纸，亭外趴着一只小花猫。我对它喵了一声，它眯了眯眼缓缓向我走来，往我腿上蹭了两下，优雅地转身，钻到草丛里去。我忍不住猜想，当年曾称霸海上的葡萄牙人是怎样登陆澳门，开始了四百多年的殖民统治。而偏偏又因为这段殖民史，留下了今天的澳门。

继续往山上走。坡边有个洋炮，旁边的通道口刻画着1931。那是贯通堡垒、炮台和驻兵营房的地下防空洞隧道，1931是它的建成年份。废置的防空洞已整修成展示廊，娓娓道出这个军事防御区的由来。站岗的职员说，20世纪的澳门并没受到大规模军事战争洗礼，但葡萄牙仍身处战局动荡的欧洲，于是间接促使澳葡驻军紧贴欧洲的现代化军事步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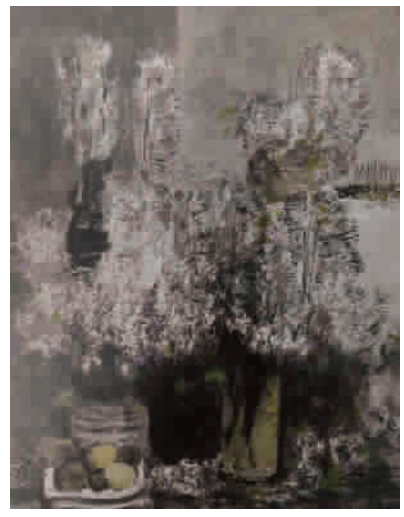
穿过防空洞隧道，山上屹立着的东望洋灯塔是中国沿海地区最古老的灯塔，古炮台更始建于1622年。澳门朋友说，灯塔弥补了大炮台的不足，最初只靠一盏火水灯照明，用作观察站和防御外来者。后来灯塔因风暴受损，重修后改为电气化运作。

我仰望着眼前的圆柱形欧式建筑。白色的灯塔带着金黄色的线条，塔顶设置了巨型探照灯，还有一个指南针。我这才知道，灯塔所在的坐标值，正是澳门在世界地图上的地理定位。在时光的磨损下，灯塔的墙身已经开始褪色，白色也变得残旧起来。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样的灯塔更有魅力。

炮台的塔楼间有一个黑色的锚，它早已失去原有的实际功能。在今天看来，它更像是一个装置艺术品，点缀着这个历史景点。灯塔旁还有一座圣母雪地殿，那是从前为守望炮台的士兵建造的教堂。在那个年代，它就是远离家乡的葡兵连接故国的桥梁。这里寄托着信仰。教堂里供着雪地圣母及施洗约翰的圣像，一个银发老婆婆十指紧扣，在圣像前低头祈祷。里面的壁画不知道绘于哪个年代，但已经斑驳破损。它们承载的是历史的重量。

天暗了。一阵风吹来，突然飘起了春雨。山上的人匆匆跑下山。炮台恢复了宁静。我没有跑，也没有撑伞。我就站在塔边，静静地，静静地，看着灯塔的灯亮起来。那是澳门的象征，那是历史的血脉。

当初它向我传来那抹微弱又坚定的光，今天我向它投去希望的目光。夜里，濛濛细雨里，在东望洋山顶上，我和灯塔一起眺望远方。



五月丁香 (水彩画) 赵云龙

银行家笑迎“天亮”

黄沂海

上海宣告解放，时任军管会主任和上海市市长陈毅在着手治理这座当年远东最大的城市时，一连串的难题接踵而至，其中最棘手的是，百废待兴之际，不法资本家趁乱哄抬物价，投机倒把，市场如何平抑？金融如何稳定？陈毅将上海滩几位工商界人士请到了办公室“聊天”，探寻申城经济固本复元之药方，座上宾里有位银行家，正是上海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兼总经理项叔翔。

项叔翔当夜起草了两份材料，一份是着力推进上海进出口贸易的建设性措施，另一份是将上海银行、钱庄、信托三家公会改组成统一的同业公会的意见书。很快，得到了军事管理委员会金融处的首肯，并由他牵头联络三家公会，于1949年12月28日组建了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

项叔翔掌管的浙江兴业银行，民国时期与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合称为“南三行”，三家银行互相支持，互兼董监，以上海为中心，雄踞富庶的江南地区拓展业务。项叔翔除了秉承“振兴实业”的办行宗旨，调度资金扶持民族工商业，还积极靠拢中共地下党组织，为爱国文化人士提供援助。抗战胜利前夕，出版家徐伯昕冒险辗转来到上海，创办通惠印书馆，以出版为掩护，聚集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进步文化人，项叔翔不仅予以资金支持，还慨然出任印书馆的常务董事。当进步报刊《文汇报》等经营遭遇困境入不敷出时，他签批发放贷款鼎力相助，联动熟识的银行、企业出资刊登广告，并以物价指数上涨幅度支付广告费，使这些与地下党互动密切的媒体得以生存和壮大。

项叔翔之所以精进不休，朝气蓬勃，具备政治头脑，同他的“朋友圈”休戚相关。在美国求学时，他与经济学家、共产党员冀朝鼎结为莫逆之交，回国后一直保持联络；他对爱国民主人士、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陈叔通十分敬重，从前辈的言谈举止中汲取追求真理、赤诚爱国的高贵品格；他的至爱亲朋中，有的参加了中共地下党，有的在新四军任职，他们的进步思想与高风亮节，同那些他经常打交道的国民政府官员有着天壤之别。项叔翔在地下党同志的引导下，利用银行大老板的特殊地位，广泛接触国民党军政高层，获取时局信息，又与爱国民主人士通过茶话会、家庭宴会等形式，交流解放战争的最新动向，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还解囊资助进步学生奔赴解放区。

上海迎来黎明曙光的前夜，国民政府加紧搜刮、封锁和破坏，大量抽逃资金，项叔翔团结金融界人士，全力配合地下党保全上海金融业“家当”。在解放军占领上海之际，面临交通瘫痪、邮电阻障、外埠分行与总行“失联”的困境，项叔翔召开员工代表大会，激励职员爱国爱行，坚守岗位，保护银行财产。硝烟散尽，浙江兴业银行居然毫发无损，在金融圈内屈指可数。

满怀信心和希望，项叔翔和留驻黄浦江畔的银行家一起踏上了新的征程。他率先邀请政府委派公股董事参加银行的经营管理，之后又带头申请加盟公私合营银行，为上海私营银行、钱庄投身社会主义改造树立了样板。1952年11月，项叔翔作为沪上银行家代表，前往北京出席全国金融业会议，在陈叔通的引荐下，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同项叔翔亲切握手，称其为“年轻有为的银行家”。

十日谈

“保险大亨”变形记。

上海的早晨

责编：龚建星